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越界与整合

黄万华选集

黄万华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编

越界与整合

黄万华选集

黄万华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越界与整合：黄万华选集 / 黄万华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1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360-7313-5

I. ①越… II. ①黄…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590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越界与整合：黄万华选集
YUEJIE YU ZHENGHE HUANG WANHUA XUANJ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0.75 2 插页 |
| 字 数 | 305,000 字 |
|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编委会

主 编 张 炯

编 委 曾敏之 张 炯 饶芃子 陆士清
陈公仲 刘登翰 杨匡汉 詹秀敏

出版说明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流播，也就伴随有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绽放奇葩，并由此构成一道趋异与共生的独特风景线。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学人，回应历经沧桑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进行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观察与探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学科领域的创获，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 and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给予持续发展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理与学术的有力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 50 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

系列，博士论文系列。分辑出版，每辑推出 8 至 10 种。其中包括：自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选集，入选学者的代表作；编选集——已故学人的精选集，由编委会整理集纳其主要研究成果辑录成册；优秀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由编委会评选推出；博士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由编委会遴选胜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将以系统性、权威性的编选形式，成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典。其意义，一是展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学术成果；二是抢救已故学人的研究力作；三是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以新视界做出新的开拓；四是凸显典藏性，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

“文库”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并选用了前贤及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方家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和疏漏错差定然不免，尚祈广大读者多加赐教。

花城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	
——兼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1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	16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	20
共生、多元、互动	
——20世纪华文文学的基本线索	33
变动不居：20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态势	41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53
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	65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81
从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看新世纪文学的价值认知	96
回报母语滋养的生命方式	
——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创作的语言追求	109
典律的生成：文学转型的基石	
——以战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为中心	121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	141
语图关系的文学史意义	
——以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考察对象	164

马华文学八十年的历史轮廓	182
20 世纪美国华文文学历史轮廓的描绘	213
远行而回归的欧洲华文文学	227
澳洲华文文学观	261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272
跨越 1949：在“常识”中展开的香港体验和想象	283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298
王鼎钧和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	317
黄万华华文文学学术年表	329
后记	335

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

——兼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同一种语言来指称晚清民初以来的文学已经有了“中文”、“华文”、“华语语系”、“汉语”等不同名称，不同指称后面有着不同的学术期待，例如“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就包含强烈的“边缘”挑战“中心”的学术建构。而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思考，则有着“中国与海外”背景下“越界与整合”的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

—

1994年，我接到孔范今先生起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大纲》，很兴奋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思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约我撰写的台湾、港澳文学有关。时至今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处理祖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港澳文学时，还时有困窘，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材为了避免“缺失”，也列入了台湾、港澳文学，但往往单独列出一章讲述台湾、港澳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两者还是“游离”成两张皮。但当年孔范今的“大纲”已经很有学术深度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视域中沟通了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之间的文学对话^①，由此，文学的多元存在的

^① 孔范今：《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176页。

胡适之与鲁迅
——黄万华一函集

种种历史（可能）性都得到充分揭示，百年台湾、港澳文学较为自然而贴切地嵌入其中。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视域的展开，使种种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存在得以重归其位。在这样一种学理视野中，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原本血脉相通的存在自然沟通，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多源多流、当道并存的对话。

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沟通祖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并不只是纵、横方向上的拓展，而是一种“越界”和“整合”的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展开，它一方面回答着晚清民初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学诞生后文学史建构遇到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史叙述自身深入展开的一种必然。

所谓“越界”，“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区域的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有时也有必要打通古今，进出现代与古代之间”。^①“五四”后的文学史叙述发生在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化的语境中，各种壁垒分明的界限随之产生，文学历史本身的多重性、流动性一度被单一化、凝固化，其丰富性自然消失。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而言，“越界”不仅必要，而且重要。“1919”、“1949”的界限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海外的界限要不要打破，能不能打破，等等，都需要我们在文化、方法、视野等方面“越界”而出。“越界”的指向是“整合”，这种“整合”是深入开掘和充分共享民族文学资源，它不抹杀各时期、各地区文学的丰富差异性，相反，它在多元性、差异性中理解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本质性存在，从而把握其整体性。

“越界”不是漠视、否定“存在”，而是从一个界域进入另一个界域而获得多重视域，从而去蔽溯源，把握社会变迁之叠合、文学演变之交错等情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既非否定“五四”

^①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版，第1页。

的革命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格局中予以更深入的把握，也非无视“1949”的转折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理解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不同界域的多重视野会自然引发对话，深化认识。例如“红色经典”，在祖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语境中，往往可以大行其道，并不会引起多大质疑。但如果我们注意到20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曾出现一批“反共经典”，我们在惊讶之余会对将“红色”、“反共”与“经典”建构在一起的做法保持谨慎，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反共经典”也有着炽热的革命激情、虔诚的政治理想和“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中，不乏感动人的魅力，如杨念慈的长篇小说《废园旧事》^①（1959）完全可视之为台湾版的《杜鹃山》（《废园旧事》除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外，也被改编成台湾最早的电视连续剧），纪纲的长篇小说《滚滚辽河》也不妨视之为台湾版的《青春之歌》，但它们的政治倾向、历史取向都是“反共”的，尽管当时作者并非自觉配合“反共”，但当局倡导的“战斗文艺”、“反共文学”即便就文学而言，也是官方文化“霸权”的产物。自然，这些至今仍被人阅读的“反共小说”绝非“反共”一言以蔽之，也绝非“反共”成就了它们的影响和名声，而是其作者创作时关注到了“文章千古事，反共只一时”^②。当我们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谈《红日》《林海雪原》《创业史》等“十七年红色小说”，也谈《旋风》《马兰的故事》《异域》等五六十年代台湾“反共”小说，从中对照思考政治高压下文学的突围，自然会明白，“红色”vs“反共”，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无关乎“经典”。经典化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如何“经典化”是文学史建构成败的关键之一，而在“红色”对照“反共”的思考中，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例如，经典本身具有的时空超越性使其具有历史

^① 《废园旧事》于2000年被收入王德威主编的《麦田小说》（重版），《滚滚辽河》在1999年重版，祖国大陆也出版其删节本。

^② 王鼎钧：《文学江湖》，台北：尔雅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其历史逻辑的修正是由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华人的经历提供的，一部可以入史的经典性作品起码应该打动海峡两岸数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才有可能被世界各国民众和我们的后代所接受。而“红色”与“反共”恰恰是历史逻辑修正的内容，它们虽伴随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却难以形成打动不同地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力量。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囿于祖国大陆或台湾、港澳都是不易觉察到的，然而在“越界”中就看清楚了。

“跨界”的研究视野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置于世界性的语境中予以考察。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得非常密切而复杂，例如，1949年前国共关系的历史变动，1949年后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受到世界性因素影响。我们应该自觉地把“中国和海外”设置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充分关注相关的历史变迁。例如，20世纪中国有过三次“留学”高潮，就密切联系着中国文学的三次“转型”，凸显出传统与现代对文学转型的重要影响。“五四”前后的留学高潮为人们熟知。传统的现代转型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包容力，而文化的包容力又与其辐射力、扩张力相反相成，晚明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外扩张力萎缩，“内敛”渗透进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传统文化呈现过熟状态，汉语本身的建构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现代转型有其潜在危机。当中国文化转而向外寻求复苏力量时，民族的速强制胜心理内在制约了对外来思想资源取舍的价值尺度，由此建立起立足于感时忧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的呼应机制，即从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出发来呼应世界潮流，有时反而滞后乃至疏离于世界文化潮流。各国（苏联、英国、日本、美国等）政府又力图通过影响中国来求得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使得“五四”挑战于传统的取舍价值尺度显得激进。然而，正是当时留学群体的不同背景（欧美、日苏等，即便是欧美，留学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其背景及其价值取向也有差异）内在构成了一种互为制约，使挑战传统不至于过分，也使“五四”思想启蒙在多种理路之中保持了某种清醒理智。第二次“留学”高潮以战后为启端，

延续到五六十年代。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依旧重视教育，战后很快恢复了派遣留学的规模，而随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中，海外旅居更成为中国知识者的一种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组织的“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中，一些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愿随蒋介石撤至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流徙海外；到五六十年代，以台湾、香港为主要出发地留学欧美的浪潮使成千上万中国知识者移居海外，而且与“五四”留学高潮不同，他们中许多人留居海外至今，“旅外文学”由此开启，从鹿桥、程抱一、於梨华、白先勇，代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成就。在战后祖国大陆、台湾都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课题，即“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新文化”（白先勇语），从唐君毅的“灵根自植”、余英时等的“文化中国”，到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其努力产生的影响都是全局的。当时台湾国民党政权也讲文化传统，但有其稳定政局之用。而海外中国作家就摆脱了现实中国政局的负面制约，他们的创作对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例如，从传统的边缘，乃至对应面，如现代主义思潮等起步，其参照系更开阔，更有利于传统的传承、发展，“出门浪子”比“守业孝子”对文化传统更有贡献；从作家个性出发来接纳外来的、现代的思想资源，恰恰能沟通传统的、民族的脉络等。鹿桥、程抱一、黎锦扬、白先勇、郑愁予、杨牧、於梨华、王鼎钧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提供了那个时期华文文学的精品，也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真正具有了“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特征。对照于此时期“五四”文学传统流散、转移到香港、台湾得以保存、发展的情况，我们也许可以切实把握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传承性。第三次“留学”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后，10多年中，120余万留学生旅居于107个国家（新世纪后，祖国大陆留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10年后，一年的留学人数就达三四十万，但他们的去留尚未确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此时期中国内地作家开始走出体制（也有一部分作家后进入商业体制），而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诱惑却吸引包括文学

黄万华自选集

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回到知识体制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从“留学”到“学留”也在体制内外进行，其情况更为复杂，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在观察之中。而对照于祖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后的“国学热”，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坚持了知识分子个人精神活动的立场，取中西互补的开放姿态，潜心探究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恰如有人所言，古者大隐隐于市；今日有古风者，大隐隐于西，无任何外力迫之，本性使然。这种本性是全球化语境和大众消费文化浪潮中避免传统文化时尚化、工具化的力量。同时，留学影响也有利于借鉴他国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即使处于体制内，也力图以其异质性保持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有可能逐步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而在我看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包括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文学转型的根本性课题就是如何在促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文学的多元化。高行健以“没有主义”走出一切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精神的“大逍遥”，而其戏剧、绘画创作对包括庄老、禅宗在内的文化传统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莫言等国内作家创作构成内在对话关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话题上提供了为世界瞩目的经验，加上严歌苓等一批新移民创作，可以代表第三次“留学”高潮的初步成果。

三次留学浪潮的背景提出的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的课题，从世界性语境中揭示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较之于只关注本土的文学史视野，“越界”显然更能调整和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观。

从“越界”和“整合”的文学史思路出发，“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可能性、可行性也在自然展开之中，也就是在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互为参照的框架中整合20世纪的中华民族新文学。2001年11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的发言题为《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可行性》^①（在

^① 黄万华：《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575页。

祖国大陆学术界，“华文文学”已约定俗成地指称祖国大陆境外的华文创作，我研究中使用的“汉语文学”包括祖国大陆、台湾、港澳、世界各国华人华侨社会的文学），认为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得到适当的学术处理的，例如，1941年底前的香港新文学作为“早期香港文学”，可视为与大陆国统区文学，尤其是海派文学强烈呼应，又在“中原心态”和香港本地化纠结中展开的文学历程，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可以在包括1931年后的伪满洲国文学，1937年后的华北、华中（包括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文学，1941年后的香港文学等在内的“日占区文学”视野中互为参照地审视，而这一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华侨”这一集体身份上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和侨居国本土进程的融合。又如，战后30年中，祖国大陆是解放区文学的强力扩展至体制化主导的格局，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离散到台湾，与台湾日据时期文学传统对话、交汇，同时，现代文学传统也流落至香港，在香港左右翼自由竞争状态中参与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展开，而此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在华侨“叶落归根”变成华人“落地生根”的历程中艰难蜕变成居住国少数族群文学，但与台湾、港澳文学却有着多向的交流。这些都尝试将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华人社区的文学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框架中展开叙述，其中“中国”和“海外”之间的对话继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两个重要支撑点，现代人文主义视域和文学多元存在的揭示。而“中国”和“海外”的互为参照，也加深了自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认识。2008年后，其他学者的著述也以不同的途径逼近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汉语文学的整合，表明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文学史叙述可以继续展开学术思考，其实践也有学术可行性。

二

为什么要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因为在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尤其是转折的语境

中，不仅需要凸显汉语的现代变革、成熟的重要性，更需要凸现汉语资源的共享性，以恢复两岸数地中国人和全球华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于中国和海外互动中，也被“分割”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多个社会体制、人文环境、外来影响等均有所相异的社会空间中的地区中，在较长的时间里，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对峙不断发生，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甚至语言的表达也指向不同的意义，导致了互相之间精神世界的“隔绝”。即便在同一个地区，由于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结，人们之间的认识也出现极大歧异，甚至存在精神世界的撕裂。这种历史的“撕裂”甚至发生在同一个地区的中国人内部，有时连外国人也惊讶，同是祖国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何以看法如此差异。然而在海外，祖国大陆、台湾、港澳不同背景的华人生活在一个国度，甚至在一个社区比邻而居，他们现实的政治倾向、态度会有相反的取向，但被兼容于日常生活共处中，远离了华文主流地区现实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主宰，多了文化的交流、共享。久而久之，语言一类共同的影响日益深刻，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认知的空间。相对于祖国大陆、台湾等地的文学，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没有被政治等因素撕裂得那么厉害，相反，作家往往在海外写作中可以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都展开对话，可以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也能进入祖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不同的精神世界。最明显的例子还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当“红色文学”和“反共战斗文学”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各领“风骚”、隔海对峙之时，无论是东南亚还是西欧、北美，其华文书写（包括原先用居住国语言写成，而后翻译成中文，但作者往往还是第一代移民，其创作内容无法摆脱现代中国变迁的影响的作品）都超越了国共之间、东西方冷战势力之间的冲突，从林语堂、鹿桥、周仲铮、白先勇、於梨华、吉铮、叶维廉、王鼎钧、郑愁予等到方北方、姚紫、苗秀、陈瑞献、温任平、王润华等，都留下了为所有中国人都会关注的作品。例如，聂华苓包括《桑青与桃红》等影响广泛的小说在内的作品为什么能早早走出由作者身世造成的政治阴影，就在于作者的海外生涯使她感受到“我的母

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①，这种“原乡”意义上的根使她超越了自身所经历的国共政治的对峙。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影响修复了海外华人和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成为全体海外华人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这一情况启发我们，文学史建构上凸现汉语的建设性，是大为有利于对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把握的。

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除了强调汉语成为共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载体外，还需要充分关注“海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除在包括祖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即便其回国以后，这种“海外背景”和海外体验也深刻影响其创作，而此类创作总体又构成深刻影响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背景”。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近年又延伸至南美洲、非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久而久之应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而已形成居住国（对于多代居住的华人而言，其居住国已是“祖国”）传统的华文文学虽在自身归属上已与中国文学无直接关系，但其“中国性”的建构仍在“双重传统”中内在“呼应”中国文学。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其又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

^①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页。